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Zhongguoshidaijingjijingjiatingdianwencong

巫宝三

经济文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Zhongguoshidaijingjimingjiajingdianwencong

巫宝三

经济文选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宝三经济文选 / 巫宝三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2

(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 张卓元等主编)

ISBN 978-7-5119-0328-0

I. ①巫… II. ①巫…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3719 号

书 名: 巫宝三经济文选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巫宝三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dsd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99 千字

印 张: 17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328-0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档案

ZUOZHE DANGAN

作者简历

主要著述

学术思想、活动、成就与贡献



一、作者简历

巫宝三（1905～1999），江苏省句容县人。1927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1932年毕业后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33～1949年先后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及南京中央大学兼职教授等。期间于1936～1938年由中央研究院派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8～1939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1947～1948年获罗

氏基金会资助，再度赴美，完成博士论文，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新中国建立后，巫宝三历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代理所长；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顾问；经济研究所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顾问；1980—1981年审判“四人帮”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审判员；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第六、第七届中央常委；第二、第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委员、常委，第六届委员、常委、副主席等职。

二、主要著述

1. 专著、译著

《中国粮食对外贸易，其地位、趋势及变迁（1912～1931）》，《国防设计委员会参考资料》第2号，1934年2月，南京。

《农业经济学》（翻译），奥伯利昂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上海。

《福建省粮食之运销》（合著）《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11种，商务印书馆，1937年，上海。

《经济学概论》（大学丛书）（翻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上海。

《农业贷款与货币政策》，《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经济问题小丛书》第2种，1940年8月，昆明。

《农业十篇》（合著），独立出版社，1943年，重庆。

《国民所得概论》，正中书局，1945年2月，重庆。

《中国国民所得（1933）》两卷（主编），《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25种，中华书局，1947年，上海。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合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北京。

《用商品生产商品》（世界名著，翻译），斯拉法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版，1991年第3版，北京。

《经济计量学》（《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第4册）（合著），商务印书馆，1964年，北京。

《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主编）先秦卷二册，1985年；两汉卷，1988年；三国至隋唐卷，1992年；宋金元卷，1996年；明清卷，1990年。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北京。

《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

《经济问题与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太原。

《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主编），商务印书馆，1990年，北京。

《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主编），商务印书馆，1998年，北京。

《先秦经济思想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

《巫宝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北京。

2. 论文

《句容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第24卷16号，1927年8月，上海。

《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社会科学杂志》第5卷1期，1934年3月，北平。

《定县主义论》，《独立评论》第96号，1934年4月，北平。

《民国二十二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1卷11期，1934年6月，上海。

《乡村人口问题》，《独立评论》第134号，1934年12月，北平。

《我国农业政策之商榷》，《新经济》第3卷8期，1940年10月，北平。

《论农村人口过剩》，《中央日报》副刊《人文科学》第4期，1941年1月，昆明。

《农业与经济变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3卷1期，1941年，昆明。

《论我国农业金融制度与货币政策》，《金融知识》第1卷4期，1942年7月，重庆。

Food Problem in War-Time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 15, No. 3. 1942, Sept. N. Y. U. S. A, 即《我国战时的粮食问题》，《太平洋事务杂志》第15卷3期，1942年9月，美国，纽约。

EX-ante Saving and Liquidity Preferenc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43 Winter, London 即《预期储蓄与灵活性偏好》，《经济研究评论》杂志，1943年冬季号，英国，伦敦。

《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华西大学《经济学报》第1卷1期，1944年，成都。

《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2期，1947年12月，南京。

《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1946》，《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2期，1947

年12月，南京。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作用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北京。

《现代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说和福利国家的几个方面》，《新建设》1964年第4期，北京。

《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亟须加强》，《经济研究》1981年第8期，北京。

《谈谈研究中国早期经济思想的意义、现状和前景》，《经济研究》1982年第8期，北京。

《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8月，北京。

《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绪论》，《经济理论与经济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8月，北京。

《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南开经济研究所系列》1984年第2期，天津。

《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序，商务印书馆，1985年，北京。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历史考察》序，《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7期，贵阳。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问题的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北京。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北京。

《先秦租赋思想的探讨》，载《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北京。

《管仲“相地而衰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贡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河南。

《唐代重商思想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北京。

三、学术思想、活动、成就与贡献

巫宝三一生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和成就，大体上可以从新中国的成立前后分为两大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主要从事中国农业经济问题和西方经济学说及国民所得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主要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一）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巫宝三从小生活在农村，因此从青年时代起，就很关心农民和农村经济问题。当 1926 年大革命浪潮澎湃发展，《东方杂志》开展关于农民状况调查的征文时，巫宝三应征发表了《句容农民状况调查》一文，对农村的阶级结构、土地占有、生产收入、各阶级的消费构成、农村的金融流通、农民教育与农民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表现了他对农民及农村经济问题的深切关注。随后于 30~40 年代，又相继发表了《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放款之考察》、《定县主义论》、《民国二十二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乡村人口问题》、《我国农业政策之商榷》、《论农村人口过剩》等一系列文章，对农村的生产状况、农产品数量、成本价格、农民购买力、农村信贷状况、城乡资金融通、利息率、农民生活程度、农村人口增殖与经济影响等，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对造成农业生产下降，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业生产成本增高，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村利息率增高，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从而形成农村经济凋敝，资金愈外流，利息愈增高的种种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切中时弊的意见。由于巫宝三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在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时，能从西方经济理论的视角，给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以经济学理论的剖析。同时，由于他对中国农村经济状况有现实的了解，因此在他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能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并以此为视角，去考察和审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意义。这就形成了他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点，即他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一般的介绍和阐述，而是十分重视与中国经济的实际联系起来，以中国经济的实际为立足点，去审视、运用和考察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际意义。30 年代后期，他曾编译出版了美国 30 年代初通用的教科书《经济学概论》，对此书，他不是单纯地作文字的翻译，而是一方面压缩了关于美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过多叙述，另一方面结合了中国的现实，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译著。此书为当时西南联大等高校采用作教科书。在 40 年代前期，巫宝三相继发表了《农业与经济变动》等关于农业经济问题的多篇论文（后编成《农业十篇》一书），其中《农业与经济变动》一文，发表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 3 卷第 1 期。该文从落后的农业国经济的现实出发，探讨了在农业国家（不同于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经济变动是如何发生的；分析了杰奉斯与谟尔的收成学说，指出它既不完全适合工业国家经济变动的实际，更不能在农业国家成立。文章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变动中的弹性需求理论，认为这一理论也是从英、美等发达工业国家总结的，对于像中国、印度等农业国家来说，就并不适用。巫宝三认为，不同的经

济变动，归根结底取决于各国经济结构的不同。对需要线的移动问题，文章认为，汉森教授的有关论点，对发达的工业国家是真实的，但对中国、印度等农业国家则不适用。文章最后批判了凯恩斯关于经济盛衰发动于农产物存积周期的观点。该文以富于理论性和创见性而获得中央研究院杨铨社会科学研究奖。

还在30年代，巫宝三就曾指出，要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必须掌握国民经济的基本状况和数据，这就需要对国民所得问题进行研究。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界，还是个未开发的领域。到30年代末，巫宝三就着手筹划这项工作。先是对国民所得概念的厘定和理论的阐发，进行深入探讨，然后与汪馥荪等五位研究人员一起对中国国民所得的实况，进行前所未有的精密测算，于1945年完成《中国国民所得（1933）》一书（上下两册），被列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丛刊之一，于194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好评。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认为此书“是对中国国民所得现有的最详备的估计”。联合国1948年出版的《各国1938~1947年国民所得的统计》中的中国部分，介绍了该书，并引用了书中的资料。此外，巫宝三在完成此书的前后，还撰写了《国民所得概论》等一系列研究国民所得的著作和论文。他在30~4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问题和对国民所得所作的研究，在理论和实际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20世纪50年代以后

1957年“反右”运动后，巫宝三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对待，直接影响到他对新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使他不得不转变研究方向。当时，他感到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个领域，一向少为人注意，在世界经济思想学说史中，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个空白，这与我国悠久、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是极不相称的。他认为整理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也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下决心要为实现这个任务而贡献自己的精力。从此，他开始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巫宝三认为，在现有的世界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中，其古代部分，只限于希腊、罗马和西欧，而没有古代东方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的部分，这显然是个很大缺陷。这个缺陷的产生，对中国来说，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本国自古代到近代的经济思想，没有做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研究成果，使一般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者，不能根据地来阐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对于世界经济思想史发展方面的贡献。因此，我国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要从中国保存的丰富的古代文献中（这是世界各国罕有的），整理和发掘经济思想，用

来丰富世界经济思想史的内容。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繁重的工作。它首先要广泛深入地研究古代文献，从中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思想、范畴和有关思想家的经济思想，逐个进行专题研究，对史料进行理论的分析，并通过充分的讨论，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论断。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与西方经济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总结出我国各个历史阶段经济思想的特点及其思想体系。巫宝三认为，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就需要正确认识经济思想的内容，要有一套研究的具体方法。这就是：首先从编辑经济思想资料入手，目的在于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各个专题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综合的系统的研究，写成各个历史时代的专著。根据这一基本设想，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鸦片战争前后这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的资料，进行了选编，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简略的论述，写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一书，于1959年出版。巫宝三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对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来说，仅仅是个初试和起步，像中国这样一个曾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的国家，封建的思想文化，在先秦时代就有过灿烂的发展史，以后各个时代的思想学说，主要是对先秦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如果不对先秦经济思想进行充分和深入的研究，以后各个时代的研究就缺乏基础。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从先秦时代开始，由古及今，循序展开。但是这一设想被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所打断。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学术机构的恢复和重建，学术活动的逐步开展，为了凝聚国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力量，更好地推展学术活动，巫宝三与胡寄窗教授、赵靖教授等，经过精心筹划，于1980年组建成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尔后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和发展。与此同时，他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为基点，与有关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多位教授、学者合作，组成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编写组，着手编写经济思想史资料、论文和专著三种著作。自1985年以来，相继出版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卷、两汉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共5卷6册，《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各1卷，专题论文集《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和专著《先秦经济思想史》各1卷。此外，巫宝三还对中国古代的重要经济思想著作《管子》一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成并出版了《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一书。同时，他还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有关论文数十篇。这些论著，对我国在新时期创建和开拓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作出了积极贡献，它表现在：

第一，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的论述。巫宝三指出，经济思想史或

经济学说史这门学科是随着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才产生的，它在西方也只有 100 多年历史。在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迟缓，经济思想一直没有突破封建主义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框架，直至 20 世纪初，在经济学说方面，只是以介绍西方经济学说为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课题，还没有提上日程。到辛亥革命后，乃有少数学者开始对我国古代经济思想有所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尤其是 80 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中国经济思想史逐渐形成为一门学科。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就需要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它的内涵、它的研究方法和它的时代历史意义等方面，有明确的理论界定和阐发。为此，巫宝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阐发和论证。首先，他考察了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的发展史，然后对它的研究对象和内涵进行理论上的界定。指出“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三者各自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大小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史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以后的发展史，起自重商主义学说的产生，它的范围最明确，时期亦较短。经济思想史研究起自古代产生的经济思想，包括早期的未系统化的原始观念、思维和主张，也包括各个时代产生的经济学说，它的范围最广。经济学说史则介乎上述两者之间，既不限于成为独立学科以后的政治经济学，也不包括原始的经济观念和见解，而以提出的观念和见解是否是一种较为有分析和有系统的知识为准。这些是从理论上所作的基本界定，但在实际上，有些政治经济学史，如卢森贝、王亚南等的著作，把古代世界的经济思想作为政治经济学前史也包括在内。也有的如罗尔的“经济思想史”实际上是“经济学说史”。纵观迄今为止已出版的经济思想史和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从内容来说，大多属于经济学说史。总体来说，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可以界定为研究经济观念和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

对于经济思想的内涵，巫宝三认为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思想基础或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二是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策方案；三是对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内在外在关系的分析。一个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常常包含这三个方面。例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既有以道德哲学作为它的出发点的哲学思想，又有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成因和各种关系的理论分析，还有由此而得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各种政策处方。但并非所有经济学家所表现的经济思想都明显具有这三个方面的内涵。例如一些数理经济学家，其所作的经济分析，并不说明其所源出的基本思想，也不提出在其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政策意见，而仅仅就经济现象和问题本身内在和外在的关系，作出说明。一般说来，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仅表

述上述经济思想的一个方面或两个方面的并不乏见，这在近代是如此，在古代更为显著。在古代，由于学科没有分立，经济问题常常是在论述哲学、政治伦理问题时作为具体问题来论述的。因此经济思想往往表现为哲理和政策观点居多，而经济分析较少。一些西方学者竟由此论断：“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西方国家中世纪僧侣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Taylor. H. C. 《东方的经济思想》，《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对这种学术上的无知和轻蔑态度，巫宝三随即撰文批判，指出：经济思想的内涵，可以归结为两种属性，一是规范性的，一是分析性的。前者在于回答“应当如何”，后者在于回答“是什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确是属于规范性的较多，分析性的较少，这在西方古代亦是如此。这是由于古代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经济关系比较单纯，经济问题往往是作为哲学和政治问题的延伸，故规范性论述居多。西方在16世纪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发展，随后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分析论证在经济学中遂占了显著地位。在古代中国经济思想中，分析性学说少，但并非没有，它同样也是构成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理论的必要部分。巫宝三列举了中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分析性论述的精华，特别是列举了中国先秦诸子中有关分析性的杰出思想。例如，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对农业生产与赋税及土地制度的关系所作的定量分析：他以晋国六卿所实行的不同亩制和亩税，推演出农业生产的盛衰来测定六卿存亡的先后。在这里孙武运用了科学抽象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从农业生产盛衰中，找出两个决定性因素，即两个自变量，把六卿摆在同一位置上，按照两个自变量的变化来考察六卿农业生产的盛衰，从而测知六卿存亡先后的不同。把问题的说明提到一个非常确定和有数量依据的高度，可以说，孙武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定量分析家。巫宝三还以齐相管仲所倡导的具有级差地租性质的“相地而衰征”的理论政策和他的“四民分业”论，荀子在《富国篇》中提出的“欲求论”及其“度量分界”与“上下俱富”的论述，孟子的“通功易事”、“体脑分工”等分工和交换关系的论述，《管子》一书中关于侈靡消费对生产反作用的分析，南齐孔颙和明代丘浚关于货币价值论的分析与论证，北宋科学家沈括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理论的论述等，说明中国古代不仅有大量规范性的经济思想，而且有一些很杰出的分析性经济思想。由上述可见，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连西方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僧侣经济思想都不如，岂非荒唐！

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巫宝三分析了思想史研究中历来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分歧，从对马、恩对杜林的批判到里士特、罗尔等西方经济思想史作者所应用的研究方法的剖析，反复论证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他反对某些以贴标签的方式,用简单类比或“套”的方法,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如以《墨子》的经济思想类比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管子》的货币学说类比法国巴丹的货币数量说等。

关于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巫宝三指出,经济科学本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不研究它的发展史,就不能了解今天经济理论形成的道路。过去的理论在解决什么问题上成功了,为什么成功了?如何成功的?反之,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些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对理论工作者正确开展理论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巫宝三还论述了研究经济思想史分别对于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和古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马、恩都曾说过,仅仅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是远远不足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还必须研究资产阶级以前的,即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对我们今天来说,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既包括前资本主义的,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因此研究从古迄今的经济思想史,无疑对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巫宝三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意义的论述,对于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创建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独立学科,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倡导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巫宝三一贯重视并主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需要与外国尤其是与西方经济思想史作比较研究,以便从世界经济思想发展的宽广视角,来考察不同社会文化体系的经济思想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别是从比较研究中,认识中国经济思想自身的特点,从而为世界经济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一份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为此,他撰写了《中西古代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绪论》一文,以中国古代的西周至战国时代(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与古希腊、罗马时代(公元前12世纪荷马时代至罗马帝国灭亡的公元5世纪)进行比较研究。先从两个社会的史实出发,分析研究各自社会的具体特点,弄清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再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两者社会经济思想的共同点和特异点。巫宝三认为,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发展具有四个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①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的共同点,但在土地关系上有很大不同。古希腊、罗马是土地私有,直接生产者奴隶,全部产品为土地所有者占有。在古代中国,直接生产者既要在公田上做无偿劳动,又要在授予的份地上劳动。公田产品归公侯,份地产品归劳动者。后来经过“初税亩”等一系列改革,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封建租佃关系逐渐形成,剥削关系从劳动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②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都早已产生,但发达程度有所不同。古希腊在公元前7世纪即已有铸币,早

于中国古代。希腊城邦居民与地中海沿岸通航方便，商业很发达。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沿岸海陆交通畅通，国内外贸易都很发达。中国古代到战国时代工商业才有了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大盐业者、大冶铁业者和大商人。但古代中国是内陆国家，且思想家提倡“重本抑末”政策，因而工商业发达程度不同于古希腊、罗马。③最初，政权都操于土地贵族，但以后通过改革，在政权构成上有显著差异。古希腊通过梭伦改革，公民按财产分为四等，所有公民都享有政治权力，从而抑低了传统贵族的权势，为非贵族的新兴富有阶层取得政治权力，开辟了道路。罗马帝国也是通过改革，不再按血缘，而按地域部族中人民财产的多寡，分为五级。血缘关系为财产关系取代。随着新兴的骑士阶层的兴起，富有的工商阶层得以参政。中国西周以来，实行宗法制与土地所有制结合为不可分的统一体，直接生产者“国人”（自由民）和“野人”（半自由民、农奴）。国人、野人和工商业者都是被统治阶级，没有政治权力。这种制度，后因兼并战争而逐渐破坏，代之而起的是政治上的绝对君权和官僚制度，经济上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和官营工商业。“士”阶层从宗法关系下解放出来，成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基本构成部分。“士”的自由活动，在古代学术思想发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工商业虽在战国以来有很大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多依附于贵族或封建统治者，在社会上未能形成一个阶级力量，这与古希腊、罗马很不相同。④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都创造了有各自特点的灿烂文化（包括经济思想），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在上述比较分析中西方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两者经济思想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

①经济哲学思想的异同。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学科都尚未分立，思想家往往既是哲学、政治思想家，也是经济思想家。经济思想都是从哲学、政治思想派生出来的。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所依据的是“自然法”的哲学思想。古代中国道家经济思想的哲学依据是“道法自然”。儒家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宗法伦理的自然秩序。但两者从中引申出的具体的经济问题和主张则不同。在古希腊，分析的是奴隶制的分工论、反对高利贷和货殖术等思想。在古罗马则是作为万民法、财产法制定的论据。在古代中国道家以之作为“小国寡民”的论据，儒家以之作为贵贱有等、贫富有差的封建体制的论据。

②生产思想的异同。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但不同的是，古希腊、罗马思想家所主张的重农，指的是重视管理好奴隶主大农庄的生产。声称奴隶主的任务就在于组织管理好奴隶劳动，要用训练野兽和

牲畜的办法，来训练奴隶。他们都明确指称他们的思想是为奴隶制经济辩护的。但在中国先秦思想家中，见不到这样的思想和言论。孔子主张“泛爱众”，墨子倡导“兼相爱”，都包括了农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庶民”。他们所说的重农，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即提出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鼓励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两种不同的重农思想，贯穿于中国和西方全部经济思想的发展中。

③交换思想的异同。商品交换、货币、市场、价格等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都早已存在，只是发达的程度和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因而反映在思想家的交换思想也有所不同。古希腊思想家认为，用游牧、农作、渔捞、狩猎等手段获取财富，是合乎自然的，正当的，而贩卖致富、货币增殖与高利贷是不自然的，不正当的，应当受到谴责。这种重农轻商的思想，主要是为奴隶制自然经济作辩护，并未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未成为国家的法定政策。在中国古代，也把农业视为本业，加以推重，而把商业称为末业，认为应予以贬抑。这种思想逐渐形成“重农抑商”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交换思想方面的很大不同。

在比较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异同的基础上，巫宝三进一步总结性地归纳出一系列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经济思想：

①封建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经济思想相比，古代中国思想家最突出的特有的经济思想，是对封建社会经济问题提出的理论命题和作出的分析。如荀子提出的“欲多而物寡”的命题，并由此对封建经济作出的理论分析。他认为人天生有很多欲望，而物质产品具有稀缺性，于是造成人群间的争夺、动乱和穷困。荀子认为，“欲”是不能完全满足的，而“求”则可以用封建等级制度的度量分界的界定去加以节制的，虽不能完全满足，但可以近于满足。随着生产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的满足水平。荀子为封建等级制社会架构了一种完整的经济理论模式，根据封建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从生产、分配、流通诸方面，用抽象方法，逻辑地展开对具体问题的论证，成为古代世界经济理论中罕见的高峰。又如《管子》中的《侈靡篇》，把侈靡消费置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范围内来考察，论述侈靡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商业与农业的相互作用问题，以此来论证“与时化变”这一重要命题。它完全可以与当代著名的凯恩斯就业学说相联系。再如大军事家孙武对六卿存亡先后所运用的经济定量分析方法，这在古代世界也是十分杰出的。

②封建主义的功利思想：商鞅的“功立而富贵随之”，以战功大小和产粟多

少作为赐爵授官的功利观，是中国经济思想中最早的封建主义“功利思想”。随后有荀子的“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的功利思想。此后韩非从“自为”和“计算之心”出发，更明确地阐述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功利思想。

③租赋思想：租赋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最普遍关心和重视的社会经济问题，因而租赋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十分发达的经济思想。中国自西周以来，农民以“藉”或“助”的形式，向贵族领主提供劳动地租，随后逐渐改变为“案亩而税”的实物地租，税和租判分为二。租税是封建社会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因此思想家都十分重视。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实行按土地肥瘠不同，征收不同的租额。此后老子、孔子、墨子等均有对租赋问题的论述。《老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孔子主张“敛从其薄”；墨子认为“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即税率都是十分之一。又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主张轻税率以增进农民的财富。这些思想家提出了“征”、“赋”、“税”、“租”等地租形式和租税率轻重问题，并都主张实行轻税率。这种普遍存在的租赋问题和租赋思想，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是难以见到的，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最突出的特有的经济思想。

④富国思想：古希腊、罗马思想家论述财富的生产和增殖问题时，主要是就大农庄和工商业者而言，重点在于富民，中国古代的富国思想则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财力为特点。如孔子的“足食足兵”、“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墨子提出的“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随后商鞅、韩非的“富国强兵”主张，强调的是封建国家君主之富，富民则成为富国（富君主）的手段。荀子写了《富国》篇，对富国问题作了专题研究，提出“计利而畜民”，“上下俱富”的原则。他提出的财富的“本”、“末”、“源”、“流”的理论，后来成为封建国家财政政策的指导思想。可见中国古代的富国思想是以封建国家和君主为主体，通过课税和官营工商业的方法，来蓄积财富为立论根据的，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以个人财富总和的增大为立论根据是很不相同的，因此中国古代的富国思想是一种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为中国所特有的经济思想。

第三，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创新见解：

①对《管子》一书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创见：《管子》一书在中国古代诸子著作中是一部论述封建国家经济问题最为全面、最为丰富的著作。它立足于封建国家的经济问题，几乎全部是宏观分析和政策主张。它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宏观经济